

HANDAI ZOUYI DE
WENXUE YIYUN
YU WENHUA JINGSHEN

汉代奏议的 文学意蕴与文化精神

王启才◎著



奏议是我国古代社会臣下上奏帝王文书的统称，也是最高统治者掌握情况、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，甚至是其加强统治的工具。奏议属于上行公文，是古代最常见的应用文体之一。

人民出版社

汉代奏议的文学意蕴与 文化精神

王启才 著



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林 敏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代奏议的文学意蕴与文化精神/王启才 著. —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9.7
ISBN 978-7-01-008034-5

I. 汉… II. 王… III. 奏议-研究-中国-汉代 IV. K234.0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08473 号

汉代奏议的文学意蕴与文化精神

HANDAI ZOUYI DE WENXUE YIYUN YU WENHUA JINGSHEN

王启才 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28.75

字数:360 千字

ISBN 978-7-01-008034-5 定价:54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

绪 论

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汉代奏议。在研究之前,有必要先交代研究对象及其背景,介绍一下写作缘起。

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中,历代臣下奏议可说是独具一格的文献,它既是祖先留下的一笔值得继承、借鉴的宝贵遗产,也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文学文体之一。

所谓奏议,是中国古代臣下向君主进呈的上行公文的统称,可分为奏言(口头)和奏章(书面形式)两种形式。通常认为,作为口头形式的奏言,在上古时期业已存在;作为书面形式的奏章,产生于春秋、战国,定型于秦、汉,“消亡”于清末,存在时间至少有两三千年。尤其是秦汉以降,奏议成了封建君主制国家决策治国、下情上达的工具,是封建社会使用较多的应用文体之一。

奏议既然是我国古代最常见的一种应有文体,从先秦至清末,数量一定不少,尽管历史上很多奏章因种种原因湮没无存,但是,仅就目前所见,且不说典籍记载有目无篇者,已是一个庞大的存在物。

打开史书,从汉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到民国赵尔巽的《清史稿》,历代二十六史多利用奏议方面的资料,尤其是班固的《汉书》,不少篇章



就是用奏议连缀而成,堪称汉代奏议的资料库。正史之外,从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到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、清毕沅的《续资治通鉴》,或多或少,也都运用了奏议资料,清代所编《四库全书》史部有“诏令奏议类”,集中收存历代奏议。从经类、子类、杂家类书籍看,诸子百家著作多保存奏议,而以儒家为最。从先秦的《尚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孟子》、《管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晏子春秋》、《吕氏春秋》,到汉代的《韩诗外传》、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、《盐铁论》,再到清《靖海纪事》、《海国图志》、《觉迷要录》、《涵芬楼烬余书录》等,都能找到一些奏议资料。

从集部类书看,从萧统《昭明文选》以下历代文学总集、别集或选集,如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、《两汉全书》、《全唐文》、《唐文粹》、《全宋文》、《宋文鉴》、《辽文存》、《金文最》、《金文雅》、《元文类》、《全明文》、《明文衡》、《明文在》、《清朝文征》、《皇(清)朝经世文编》、《昭明文选》、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古文渊鉴》、《古文观止》、《古文辞类纂》、《经史百家杂钞》、《骈体文钞》及其它名为《文选》、《文鉴》、《文海》、《文类》、《文纪》、《文钞》一类书,都选有奏议。从个人方面看,历代著名文人或大臣,在其或后人为其编的《文集》、《选集》中也多存有奏议。

奏议是决策之依据、资政之龟鉴,所以,历代统治阶级都非常注意收集、整理奏议的档案工作,后代君臣遇到相似问题,一般都要翻阅前代奏议档案,作为执政、决策的主要依据。从宋代开始,奏议类总集、专集或选集一类的书应运而生,比较著名的有宋赵汝愚《国朝诸臣奏议》,明黄淮、杨士奇《历代名臣奏议》,明汪少泉辑《皇明奏疏类钞》,清抄本《皇清奏议》,王云五编《道咸同光四朝奏议》,以及今人丁守和等主编的《中国历代奏议大典》等。

汉代以降,不少大臣有奏议专集传世,如汉陆贾《新语》,唐陆贽《陆宣公奏议》、宋范仲淹《范文正公府奏议》、包拯《孝肃包公奏议》、明张居正《张文忠公奏疏》、戚继光《戚少保奏议》、清李煦《李煦奏折》、曾国藩《曾国藩奏折》、袁世凯《袁世凯奏议》等。

此外,臣下的奏议也有一小部分被保存在皇帝的诏书里。且不

说东汉以后,不少皇帝诏书,实由臣子代笔;单说诏书本身,按日本大庭脩的观点,汉代诏书按其内容可分为三种形式¹,其中二、三两种形式皆由臣子奏议构成,尤其是第二种形式,其主要内容就是臣子奏议,下面加上皇帝的批示:“奏可”。

从汉代碑刻,如《孔庙置百石卒史孔龢碑》等,以及近代以来出土的汉代文献中,如甘肃《敦煌汉简》、《居延汉简》、江苏连云港《尹湾汉简》等,也发现了一些臣下的奏议。

从本书的研究对象说,汉代奏议主要保存在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七家后汉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两汉纪》、《汉官六种》等史书或典章制度书,或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、《两汉全书》、《文选》、《古文苑》、《古文辞类纂》、《新语》、《贾谊集》等总集或个人文集,或专门类奏议书,如《历代名臣奏议》、《秦汉书疏》、《两汉书疏》、《西汉书疏》、《东汉书疏》、《广汉疏类编》等,以及《居延汉简》等出土文献中。

“前汉表谢,遗篇寡存”,刘勰的这句话讲的虽是西汉奏议的保存状况,如晁错,《汉书》记载他上文帝书30篇,现在流传下来的仅有9篇,但也适合东汉。如果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,汉代奏议已亡佚不少,那么,时至今日,传下来的就更少了。尽管如此,对照以上诸书,今天能看到的汉代奏议以及有目无篇者,尚有近1300篇。从现存的汉代奏议中,管窥蠡测,尚能见其整体面貌之一斑。

现在看来,奏议属上行公文,是应用文体之一,尤其是明清时期,奏议有文学性逐渐减少、应用性不断增强的趋势,但在古代,所谓的文学,是一种“杂文学”观念,奏议一直属于文学,先秦两汉时期尤其如此。所以,奏议是受古人重视的文学文体之一。

且看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对“文”涵义的界定问题。

早在殷商甲骨文里,已有了“文”字,𠄎,从其字的象形看,像裸体纹身之人,其最初含义,是指在人的肌肤上刺画花纹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说:“文,错画也。象交文。”王筠解释说:“错者,交错也。错而画之,乃成文也。”朱芳圃《殷周文字释丛》说:“文即文身之文,象人



正立形……即刻画之文饰也，文训错画，引伸之义也。”可见，“线条交错组合成图案”这一义项是从“纹身”引申而来。《易传·系辞下》说：“物相杂，故曰文”，此处的“文”指纹理、花纹，《广雅·释诂》说：“文，饰也”，义为装饰或修饰，后来又有“华丽”之义，如“君子质而已矣，何以文为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；“美”之义，如“文言多，实行寡”（《韩非子·说疑》）。“文言”就是美丽的言词。“华丽”、“美言”两个义项，对今天的文学观念影响很大。

不过，在先秦“文”的含义非常宽泛，大致相当于今天广义的文化（culture）概念，如《周易·贲卦》彖辞说：“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”所谓“天文”，是指自然现象及其规律；所谓“人文”，是指社会现象及其规律。人生活在天地之中，“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”，对自然万物形色交杂所呈现的文采表象，有比较直观的感受，所以“天文”较好理解；“人文”则较抽象，指人与人交往形成的君臣、父子、夫妻、兄弟、朋友等的关系，这种关系具有复杂的伦理表象，故名。《文心雕龙·征圣》说：

先王圣化，布在方册；夫子风采，溢于格言。是以远称唐世，则焕乎为盛；近褒周代，则郁哉可从：此政化贵文之征也。郑伯入陈，以文辞为功；宋置折俎，以多文举礼：此事迹贵文之征也。褒美子产，则云“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”；泛论君子，则云“情欲信，辞欲巧”：此修身贵文之征也。

在以上话中，刘勰又进一步把“人文”分为“政化”、“事迹”和“修身”三方面，足见“人文”范围包罗之广。值得注意的是，“修身”之文指人内在的质地、美德、才能，自然也包括言语、辞令，因为《论语·宪问》说“有德者必有言”，而言语、辞令之文，其涵义已接近于书辞文章。先秦时期也出现了“章”，“文章”，但其涵义古今不同。章，早期字形作，表示用“辛”（刻刀）在玉石上雕刻花纹，有文采。如《尚书·皋陶谟》说：“天命有德，五服五章哉！”“五章”是指五种不同的色彩图案，其作用是区别尊卑不同的“五服”。至于《周易》中的“含章”²，《诗经·小雅·六月》中的“织文鸟章，白旆央央”，其涵义均指

色彩美。又,《说文》说:“乐竟为一章,从音从十。十,数之终也”,章太炎《文学总略》说:“八风从律,百度得数,谓之章”,章的涵义是音乐美。至于色彩(美)和音声(美)究竟谁是原初本义还有待深考,但“章”含有美的特性,则是可以肯定的。

文章是文与章的复合,《周礼·考工记》说:“青与赤谓之文,赤与白谓之章”,文和章就是色彩的不同组合,这是单独使用时的涵义;合在一起用的,后世不断增多。如《荀子·王霸》说:“目好色,而文章致繁,妇女莫众焉”,其中的文章指色彩;《论语·公冶长》说:“夫子之文章,可得而闻也”,则指六艺典籍等古代文献的学问;《毛诗序》说:“厉王无道,天下荡荡,无纲纪文章,故作是诗也”,指礼乐法度;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说:“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”,指典籍制度,等等。而在后世,“文章”则是以书面形式存在的文体总称,可见古今涵义相差甚远。

先秦时期也有“文学”一词,只是与后世的涵义大不相同,如“文学:子游、子夏”(《论语·先进》),指的是博学古文;“人之于文学也,犹玉之于琢磨也”(《荀子·大略》),则指古代典籍和礼仪制度方面的学问。由以上“文”、“文章”、“文学”的涵义可以看出,在先秦,文史哲不分,文学、文章和文化、典章制度、知识学问混同,因此,臣子善于言辞,能讽谏君主,当然在“文”之列。

到了汉代,“文”一般指文章,“学”指经学或学术。郭绍虞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上卷第一章第一节“‘文学’、‘文章’、‘文辞’之区别”,排比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史料,考辨甚详,他说:

以含有“博学”之意义者称之为“学”或“文学”;以美而动人的文辞称之为“文”或“文章”。如此区分,才使文学与学术相分离。

……所谓文学云者,自广义言之是一切学术的意思;即就狭义言之,亦指儒术而言,固不得以词章当之了。

至于不指学术而带有词章的意义者,则称为“文章”或“文辞”。³



郭先生的观点论从史出,现在看来,仍不失为公允。

既然汉代“文学”指经学和学术性著作,“文章”指的才是文章、文学,那么,奏议是否属于“文”呢?东汉王充明确指出:奏议为文之一种。他在《论衡·佚文》中说:

文人宜遵五经、六艺为文,诸子传书为文,造论著说为文,上书奏记为文,文德之操为文。立五文在世,皆当贤也。

在封建社会,尊卑分明,臣民“上书”皇帝,才称奏议,而上书皇后、太子、宰相或上级官府,一般只称“奏记”,这是由受文者的身份、对象不同而作的区别,但无论如何,二者同属上行公文,都是“书辞”文章之一种。

再从古代传统的文体分类法和历代文集或别集、选集收录的门类和对象看,奏议始终是文学文体和门类之一。

汉代虽已意识到学术和书辞、文章的区别,但尚未对文体进行分类,魏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第一次把当时的各种文体分为4类8种,并各用一字概括其文体特征,他说:“夫文本同而末异,盖奏议宜雅,书论宜理,铭诔尚实,诗赋欲丽。”曹丕把奏议放在“文”之首位,并指出其文体特征为“雅”。又说文章尤其是奏议,是“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”,这种经典性概括,对后世文体分类、奏议写作,影响深远。其后,晋人陆机在《文赋》中论及诗、赋、碑、诔、铭、箴、颂、论、奏、说十种文体,其中有奏议,并指出了其体貌风格是“平彻以闲雅”。晋李充《翰林论》(现存佚文)开列的有表、论、议等文体,并指出了议、奏文体的渊源,“在朝辨政而议、奏出”。可见在魏晋时期,奏议也是“文”之一种。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批评巨著,在其20篇文体论中,有3篇专门论述奏议,它们是《章表》、《奏启》和《议对》。所以,奏议不仅是“文”,而且是“经国之枢机”,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

被后世称为“文章渊薮”⁴的《文选》,为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,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,其中收有“表”、“上书”、“启”、“弹事”等奏议文体,齐梁以至近代,文章总集、别集和选集几乎都有奏

章,可见在古人眼里,优秀的奏章就是文学作品。不仅是古人,就是今天大学通用教材,如《先秦两汉散文专题》、《大学语文》、《历代散文选》、《历代文学作品选》,也都选有奏议,如李斯《谏逐客书》、贾谊《论积贮疏》、晁错《论贵粟疏》、枚乘《上书谏吴王》、诸葛亮《出师表》、李密《陈情表》等文,就是历来传诵的散文名篇。再回到历史上来,明代前、后七子,为文宗法秦汉,追求革新,被成为“秦汉派”,其中前七子以李梦阳、何景明为代表。《明史·李梦阳传》说:

(李)梦阳才思雄鸷,卓然以复古自命。弘治时,宰相李东阳主文柄,天下翕然宗之,梦阳独讥其萎弱。倡言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,非是者弗道。

李梦阳主张“复古”,从其“劝人勿读唐以后文”,⁵可推知“古”就是指先秦、汉魏,尤其是秦汉时期。就秦汉文来说,奏议应占相当的比重,因为秦代文学只有一个代表作家李斯,而李斯的主要代表作《谏逐客书》,即属奏议,此外,其作品流传至今的还有《狱中上书》等9篇奏议,12篇短小的铭文、刻石,1篇书论。汉代文章主要是政论文和史传文,其中政论文在东汉中期以前主要是奏议,刘开《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》说:“文莫盛于西汉。而汉人所谓文者,但有奏对封事,皆告君之体耳。”李梦阳曾作《刻贾子序》,对贾谊散文非常推崇。贾谊的奏议《治安策》,在单篇文章中篇幅最长,是西汉“鸿文”;史传文,尤其是《汉书》,在其传记当中,也选录了大量奏议,由此可见,奏议在秦汉文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和分量。

综上所述,在中国古代社会,奏议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体,其中优秀的篇章是臣子用忠诚、智慧、心血甚至生命铸就的,多具有文采,或本身就是文学名篇,在文史哲不分的先秦、秦汉时期,尤其如此。所以,对汉代奏议进行研究,也是文体学、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。本成果既然选定汉代奏议作为研究对象,就有必要对其适用范围和使用情况略作说明,以免引起歧义与误会。奏议指臣下上皇帝书,在通常情况下,上书皇(太)后、太子、三公、上级官府的,统称奏记,但汉代各阶段情况也不尽相同,如西汉初期,诸侯王国具有很大的独立





性,能自己任命官员,不少诸侯王如吴王、梁王、淮南王都喜欢招贤纳士,其宾客虽然比较自由,有战国纵横家之遗风,但在王国内又是君臣关系,所以枚乘、邹阳的上书,仍属于奏议。王莽的情况比较特殊,在做臣子时,尽管大权在握,其上书仍属于奏议;一旦其代汉自立,下行文就成了诏令。东汉中、后期,皇帝一般幼小或暗弱,皇太后临朝称制,宦官、外戚交互专政,这时期臣民上奏太后的文章,就不是奏记,而是奏议。此外,据史书记载,汉代臣民上书曾几次出现令(请)人捉刀现象,如西汉陈汤“明法令,善因事为势,纳说多从。常受人金钱作章奏,卒以此败”⁶,东汉班固为第五伦写《荐谢夷吾疏》⁷,马融为梁冀起草诬陷李固的奏章⁸,张竦代好友陈宠草就《颂莽功德疏》,再由陈宠把奏章献上,这些都是特例。不过代人捉刀者所起草的奏章,体现的仍是上书人的意愿,《颜氏家训·文章》说:“凡代人为文,皆作彼语,理宜然矣。”该情况和原先农村通讯不发达,有的农民没文化,不能回信,只能自己口述请人代笔是相似的。汉代察举时“文史试章奏”⁹,能写章奏,是入仕为宦的基本要求之一,汉代文人整体文化水平较高。所以,本书倾向于认为,在正常情况下,奏议是作者自己写的,表达的是其心愿和看法。

下面谈一下奏议研究的历史和现状:

在我国古代,奏议虽是文之一种,但其与诗、赋相比,文学性较弱,所以魏晋“文笔”之争时,奏议已属于“笔”,是文章学范畴的东西,属于适用性很强的公文,人们注意的重点逐渐放在其内容——所提的问题及其对策上,对增强其形象性、说服力的文辞反而不甚重视。近代以来,受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影响,再加上学科分类趋于细化,奏议一类“杂文学”研究(内容上属于政治学、历史学、档案学,形式上属于公文、文章,又包罗甚广),受到了相当的冷落。

奏议是目前散文史、文学史研究中一个有待深入开掘的领域。1978年以来,本领域发表的论文只有张建业《文学史研究中一个不应再忽视的领域——论历代名臣上帝王书的价值》、刘振娅《论历代奏议体散文的文学成就》、闵泽平《汉代奏疏艺术论略》等寥寥数篇,

且较为概括,横向拓展、深度开掘、综合创新等都嫌不足。至于专门对某一奏章从文学角度进行分析、研究的论文,除李斯《谏逐客书》、贾谊《治安策》等名篇外,其余为数也不多。《中国文学史》、《中国散文史》、《中国政论文学史》、《中国文化史》、《士与中国文化》、《秦汉士史》、《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》等通史或秦汉专门史,有的虽有涉及,但只是概略介绍,失之笼统。与汉代奏议相关的书,目前有明代黄淮、杨士奇的《历代名臣奏议》,张建业、王玉璋主编的《历代名臣上皇帝书》,丁守和等主编的《中国历代奏议大典》,杜涌、左羽主编的《文白对照》《历代上皇帝书》,刘振娅的《历代奏议选》、夏兵主编的《中国历代名臣名谏》,陈有兵、王德寿编著的《国策论辩》等,以上诸书所做的工作,都是对历代奏章进行选编、注释、翻译、题解和评点,至于对汉代诏书、章奏、官府文书,司法文书等进行综合考释、研究的专著,目前仅见汪桂海的《汉代官文书制度》一种,该书主要从历史学角度论述了汉代官文书的各类程式,及其制作、运行和管理概况,从文学、文体学、美学与文化精神角度专门对奏议进行综合研究、论述的著作,迄未见到。所以,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奏议研究之不足,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开拓意义。

本书从文体学角度切入奏议——这个以往人们不大重视的领域,透视文本的表层和深层结构以及所折射的世界,新的知识“生长点”选得好;不把文本当作绝对封闭的自足体,在文学分析的基础上,开掘其蕴含的文化内涵与民族精神,兼顾对奏议作者与受文对象的研究,同时将文体构成因素的具体、实证分析与文体风格的整体观照融合起来,既探讨文体的既定形式,也研究文体的生成过程,力求打通文史哲,理清线索,辨明、勾勒出士大夫心态与政治、文学的关系,观点新;借鉴、运用西方文体学、政治学理论,充分利用秦汉出土文物、简帛资料和地方文献,并努力将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,方法好。

本书以文体学为视角,以文(美)学、文化学、政治学理论为支撑点,以君主制尤其是封建中央集权制、言谏制度的发生、发展的历史作大背景,选取汉代奏议作深入开拓研究,以理出汉代奏议发展的脉



络,总结奏议文体的功能、文学特点,挖掘材料背后的文化意蕴,厘定奏议与汉代君主政体、思想文化、国家风貌、民族精神、社会风情和士人心态等的关系,看奏议生成、演变状况,考察它呈现出的特点,提供了哪些可资借鉴的东西,对后世的影响如何,尽可能在中国政论文、应用文演变史,乃至整个学术文化史中对其功能、地位和影响等,作出较为准确、客观的评价,力求在汉代奏议的整体研究,在奏议文体、汉代文学、公文、应用文等研究领域,有所突破。

“章表奏议,经国之枢机”¹⁰,本书在选题方面以古鉴今,有助于新时期精神文明的开展,民主、法制的建设;对于认识奏议文体的生成、功能和特点,认识汉代文学尤其是政论散文的发展、嬗变、对后世的影响,认识汉代政治制度的文化内涵、国家风貌、社会风情、士人心态等都有助益。此外,从汉代奏议中,人们还能学到从政的经验和智慧,提高现代公文的写作技巧与水平。

本书的重、难点:从文学、文体学角度对汉代奏议进行阐释是重点,其难点如下:第一,“前汉表谢,遗篇寡存”,汉代奏议流传下来的较少,要运用近年出土的汉代考古资料,要从大量的史书、著述、杂记、评点中点滴搜求资料。第二,辨析中外文体分类学、政治学的特点及其异同,把理论与具体问题妥帖地结合起来。第三,弄清先秦两汉文史哲互涵互动的关系。第四,解决时间跨度大,材料多,奏议的行文对象和作者个性差异大,时代状况、具体情景各不相同,不易把握与提炼等问题。

针对这些难点,拟采取通史视野与断代深入相结合,文本解析与文学、文化阐释、士人心态洞察相结合,文献辑佚、考证与综合创新相结合的方法。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,从文体学、文化学、历代奏章出发,从网络光盘、目录文献入手,以大文学史、文章学、文献学、文化史为背景,先了解该课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,以确定主攻方向和创新点;认真阅读奏章文本以明确“是什么”;广泛阅读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两汉纪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等史书及地方文献,以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,即“怎么样”;钻研相关的理论以探讨“为什么”,

升华、深化观点。要之,在广泛深入地搜集、爬梳资料的基础上,找准各个突破口与创新点,由点到面,由小到大,理出线索,构建框架,展开论述,形成《汉代奏议的文学意蕴与文化精神》这一项目成果。

注释:

1. [日]大庭脩:《秦汉法制史研究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,第189页。
2. 《坤卦》六三、九五爻辞各出现一次。
3. 郭绍虞: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上卷,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,第40、42页。
4. 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卷十九《文选注》提要。
5. 王世贞:《艺苑卮言》卷一。
6. 《汉书·傅常郑甘陈段传》。
7. 《后汉书》卷82《方术列传》说:“及(第五)伦作司徒,令班固为文荐夷吾。”
8. 《后汉书·马融列传》说:“……遂为梁冀草奏李固,又作大将军《西第颂》,以此颇为正直所羞。”
9. 《后汉书·邓张徐张胡列传》。
10. 《文心雕龙·章表》。





绪 论



第一章 奏议文体的涵义、源流、特点和功能

第一节 奏议的涵义、名称、文体归类、特点和功能 /1

一、奏议的涵义与名称 /1

二、奏议的文体归类 /9

三、奏议文体的特点和功能 /13

第二节 先秦奏议探寻 /22

一、奏议探源 /22

二、先秦奏议追寻 /31



第二章 汉代奏议概貌

第一节 汉代奏议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/45

第二节 汉代奏议的写作、编纂、邮传与管理 /58

一、汉代奏议的写作、编纂与流传 /58

二、汉代奏议的管理、邮传与收藏 /66



第三章 汉代奏议的议事范围与文化精神

第一节 汉代奏议的类别与议事范围 /77

- 一、议政 /78
- 二、荐举 /92
- 三、谏诤与弹劾 /95
- 四、上贡与颂贺 /98
- 五、言灾异 /99
- 六、谢恩与乞骸骨 /100

第二节 汉代奏议的文化意蕴 /104

- 一、追求实用 /105
- 二、体现“大汉气象” /107
- 三、忧患意识和参与精神 /110
- 四、依经立义 /115
- 五、天人感应与灾异谴告 /124
- 六、“与其危君，宁危身”的讽谏文化心态 /129

第三节 汉代奏议的民族精神 /136

- 一、立大志干大事的事功精神 /137
- 二、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/139
- 三、富于牺牲的理性批判精神 /141



第四章 汉代奏议的文学价值与美学阐释

第一节 汉代奏议的文学价值 /149

一、文学价值 /149

二、文风的衍变 /153

第二节 汉代奏议的美学阐释 /163

一、汉代奏议的个性特点与人格美 /163

二、汉代奏议的典雅美 /169

三、汉代奏议的尚情任气 /178

四、汉代奏议灵活机智的进谏艺术与方法 /188

五、汉代奏议的哲理与思辨色彩 /198

六、汉代奏议的篇章美与修辞特点 /204



第五章 汉代奏议的文采探因及影响

第一节 汉代奏议的文采探因 /239

第二节 汉代奏议的影响与历史作用 /254

一、汉代奏议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/254

二、汉代奏议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/267

三、汉代奏议的借鉴意义 /277